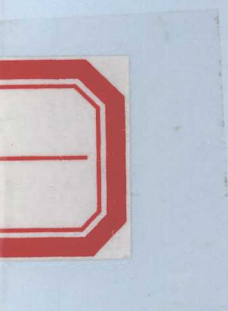




权利、政治和奥运会

[美]阿尔弗雷德·赛恩 著
贡娟 宋健 孟爽 译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权力、政治和奥运会

(美) 阿尔弗雷德·赛恩 著

贡娟 宋健 孟爽 译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 李 建
责任编辑 曾凡容
审稿编辑 李 飞
责任校对 容 一
责任印制 陈 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政治和奥运会/(美)阿尔弗雷德·赛恩著;贡娟,宋健,孟爽译.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1100-837-1

I. 权… II. ①阿…②贡…③宋…④孟… III. 奥运会-国际政治关系-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6623号

权力、政治和奥运会

(美)阿尔弗雷德·赛恩 著
贡娟 宋健 孟爽 译

出 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
网 址 www.bsup.cn
邮 编 100084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北京市昌平阳坊精工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册

定 价 40.00元

(本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阿尔弗雷德·赛恩（Alfred Erich Senn）是麦迪森威斯康辛大学的历史学名誉教授，他自1961年开始一直在该校从事教学工作。他于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东欧历史学的博士学位。赛恩共出版了8本书、几部专著以及大量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他的《Gorbachev 在立陶宛的失利》一书于1996年被美国波罗的海研究会授与爱德格·安德森总统资金。赛恩教授与夫人现居住在威斯康辛州的麦迪森。

序

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普世性的体育文化，它虽然不是政治，但其生存与发展始终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说：“我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95%的问题都与国内和国际政治有关。”前任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强调：“他每天处理的问题90%是政治问题，10%才是体育问题。”2000年，在第一届劳伦斯世界体育奖的颁奖仪式上，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2005年，为争得2012年奥运会的申办权，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国家首脑，相继奔赴新加坡参加了争办奥运的活动，并都将之视为凝聚人心、缓解国内矛盾、提高执政能力的政治资本。我国《体育“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坚持体育为人服务，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2005年元旦献辞中指出：“新时期中国体育事业将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服务，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以上这些事实，足以证明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赛恩所著的《权力、政治和奥运会》揭示了现代奥运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斜述了历届国际奥委会主席调解政治与奥运关系的能力，以及奥运对国际政治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例如，国家间正义与阴谋的曝光、恐怖与反恐怖的较量、利益的摩擦、种族的纠葛、媒体的争端、信仰的冲突、竞技异化现象的干扰等。作者赛恩认为：“奥运会作为金融、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焦点，仍然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并吸引着关注和尊重。一些评论家想要把重点放在奥林匹克理念上，反对关注那些不光彩的问题和政治。在现实

生活中，奥运会支持者的理念和许多参加者的实践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影响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的障碍。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国际性的、四年举办一次的多项目的体育竞赛。奥运会的竞赛是最高水平的精英运动，因此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定期举行的国际集会。奥运会中，精英竞赛的广泛吸引力使得它在世界政治、文化甚至经济生活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我们的目的就是追溯这种重要性的发展。”可见，这些问题对于促进奥运与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中国承办北京奥运，促进国家和平发展，提供文化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贡娟副教授、长春理工大学体育部宋健同志和长春大学的孟爽同志，面对国际社会对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和平的新要求，以及中国社会“对内求和谐，对外求和平，两岸求和解，以和平天下”的新需求，利用大量的时间翻译了本部专著，值此献给2008年北京奥运会，献给广大读者。

宋继新

2007. 5. 28

引 言

如今，奥林匹克运动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定期举行的国际盛会，因而，它也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政治舞台。这一盛会的主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计划使这个舞台充满神圣的仪式。电视作为奥运会与世界沟通的基本方式，也正在计划将它的转播变成一种有着最大观众群体的娱乐方式。所有这些努力使奥运会吸引了比其他任何活动都多的关注。这种展现在全球观众面前的竞赛中，大国有机会表现他们的实力，小国也可以就其在某些进步方面得到认同，而新参与国也能通过运动员的入场式得到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认可。对于参加国的政治首脑及其国民而言，其国旗在奥运会上的每一次出现都是一个美妙的时刻。

对于宗教信仰徒而言，奥运会可以激发其宗教感情。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先生曾提出“运动的宗教”，称运动为一种“有着自己的教堂、教义、仪式，却超越任何宗教感情”的宗教。国际奥委会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前，曾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我们比天主教还要重要”，这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对。他在1997年5月接受立陶宛记者采访时解释说：“我被误解了。有人说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为了一种宗教，但我们不能这样说。但是，奥林匹克运动比任何宗教都广泛。”

尽管许多体育迷认为政治是奥运会最不受欢迎的侵略者，但政治正是奥运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奥运会的魅力以及人们对它的关注使得奥林匹克运动具有了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力。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Lord

Killanin) 爵士确认了这一点, 他写道: “我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 95% 的问题都与国内和国际政治有关” (1983)。实际上, 从各个国际体育组织通过相互影响与密谋认证国家运动队到国际奥委会的内部斗争, 奥运会的政治因素极其复杂。各国政府都想利用奥运会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 同时奥委会自身也向政府施加压力。因此, 奥运会成为国际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的焦点自然不足为奇。

同时, 奥运会的参加者与非参加者也都在利用奥运会实现自己的目的。运动员违反规定的事时有发生, 小到带朋友进入奥运村, 大到因使用兴奋剂而导致许多金牌得主的冠军头衔被剥夺。运动员还曾公开被卷入政治斗争中。1968 年在墨西哥城, 两名美国运动员向黑人力量敬礼, 就正是利用了奥运会这个机会来使自己得到世界的关注。国际奥委会不赞成这样的行动, 但是他们也没有阻止乔治·福尔曼 (George Forman) 在获得拳击比赛的胜利之后挥动美国国旗。不管是政治的、非政治的或者是反政治的, 这些表演在许多观众眼中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

庄严的奥林匹克舞台对于非体育团体也有很大吸引力。1996 年夏天, 象征着将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信息传到美国最遥远角落的火炬接力, 不得不考虑穿越一些印第安部落统治地区或立法反对同性恋的地区。亚特兰大奥运会进行过程中, 国际特赦组织曾谴责佐治亚州执法系统执行死刑。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的准备过程中, 澳大利亚土著团体也在讨论如何将他们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土地政策的反对公布于众。所有这些情况中, 个人和团体都将奥运会看成了一个可以传递他们信息的媒介。

历史上还曾发生对奥运会造成外部侵害甚至带有流血的威胁事件。在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上, 恐怖分子劫持了以色列人质以博取全世界对他们反抗以色列政府的关注。最终, 所有人质死亡。一名恐怖分子曾解释说, 他的伙伴攻击奥运会以赢得关注是因为奥运会是“西方世界的现代宗教”中“最神圣的庆典”。这

段话也曾被基拉宁爵士引用。然而，人们必须知道，在政治刺杀的历史中，相对中立领域中的攻击是非常少见的。事实上，我们排除奥运会是精心安排的庆典这一因素，奥运会的受关注程度本身就使其成为了对于政治和社会运动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目标。

正是由于有了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惨痛经历，奥林匹克官员不得不将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到针对奥运会可能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上。在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周，鉴于俄克拉荷马州联邦法院的爆炸事件、东京地铁站毒气事件、对驻沙特美军的爆炸袭击和莫斯科公交系统不时地爆炸事件的记忆，亚特兰大安全保卫部队采取了最高警戒措施。开幕式 3 天前，一架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的失事更加重了人们的担心，然而调查人员从未查明飞机坠毁与爆炸的原因。据报道，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安全保卫人员的数量是参赛运动员的 3 倍，尽管如此，一次炸弹爆炸还是干扰了此次盛会。到现在为止，官员们还没有找出爆炸的动机。1998 年长野冬奥会前夜，日本激进分子向成田机场发射了几枚迫击炮弹。很明显，这就是为了挑战奥运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在奥运会发展的过程中，组织者们不得不准备应付越来越多的外部事件，尽管有些并不针对奥运会本身。

作为一个并不欢迎政治蔓延的独立组织，奥运会和国际体育运动却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本身包含了对抗和压力。体育历史中包括了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的许多囚犯戏耍追捕者，以及殖民地人民在殖民者认为他们将获胜的比赛中挑战殖民者的故事，比如英国殖民地的板球运动。1940 年，波兰战俘就秘密地进行了一次“囚犯奥运会”，并以此骗过了德国人。对于抓捕人以及统治者（或前统治者）的这次胜利，非常明显而确实带有政治象征意义。一位学者曾将奥运会称为“国家间隐性的战争”（Moragas Spa, Rivenburgh, Larson 1995）。

长时间以来，美国人一直试图抹杀奥运会的政治因素，经常将奥运会的政治压力归因于美国与苏联的“冷战”的恶劣影响。在那时，苏联评论家经常谴责美国人抹杀体育与政治关系的托词。一位国际奥委会的苏联官员阿列克谢·罗曼诺夫（Aleksi Romanor）曾指出：“现在，国际体育作为一项巨大的社会运动，已经成为一个尖锐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竞技场”（1963年）。在其他场合，他抱怨西方世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伪善：“现在，资本主义代言人正在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非常努力宣扬‘体育远离政治’这个口号，宣扬非政治性，是帝国主义圈子直接面向苏维埃阵营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另外一个手段”（1973年）。现在，既然冷战已经结束，也已退出了奥林匹克舞台，美国评论家必须认识到在奥运会中还有其他的更加深层次的政治因素。

有些评论家将体育看成一种“跨国的”而非“国际间的”现象，提出竞赛应由独立于各国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参加。事实上，奥运会组织者正是由政治实体来限定的。反过来，政府也在财政上支持他们的国家运动队。许多政府设立了体育部门以监管其国家体育运动计划，所有人都为他们的冠军而欢呼。

有时，奥林匹克的准入规则是模糊的。奥林匹克家庭的成员数甚至多于联合国的成员数。波多黎各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而作为国际足联成员的苏格兰却不是。1992年，西班牙根据联合国的指示拒绝了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整体队伍参加奥运会，但是在国际奥委会的坚持下，准许南斯拉夫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奥运会。1996年在亚特兰大，厄立特里亚成为唯一一个没被国际奥委会认可的联合国成员，因为国际奥委会还没有认可厄立特里亚的奥委会。在任何情况下，国际奥委会在是否认可一个成员这点上都有着相当的权力。

同样，政府经常将体育作为他们国际政策中的武器或一条传递特殊信息的通道。1960年，东德，也就是民主德国，坚持他们的运动员应持东德护照，就是为了取得西方国家的认同。原民主德国一位作者曾这样写到：“体育运动的成功

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1971年的乒乓外交将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带到了中国，证实了中国与美国重新建立政治联系的意向。1976年，非洲黑人国家将运动员从蒙特利尔撤回，他们是想以此给南非的种族隔离一次打击。但是在面临国际社会的抵制时，南非的反应正是利用了明显的政治口号——“非政治的体育”。

体育竞赛同样可以加剧国际社会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之间的“足球战争”非常著名。同样，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的革命之后，在墨尔本进行的水球比赛也是如此。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如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乌拉圭就德国足球运动员的行为对荷兰进行了外交抗议；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与捷克进行的曲棍球赛等（1968年苏联违反《华沙条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人们还能记得1908年在伦敦的关于国旗问题的争论、一战后在安特卫普和巴黎奥运会上排除德国以及抵制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的呼声。

国际体育竞赛中的胜利可以影响国家意识的发展。希腊王室希望用最初在雅典举行的奥运会来加强他们的国家形象。同样，在1995年~1996年，后种族隔离的南非领导人尼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发现他们的橄榄球和足球队的国际比赛胜利对于试图建立新的国家身份非常有帮助。从少数民族组织身上也可以找到同样的信息：墨西哥城奥运会上，美国黑人运动员的抗议震惊了世界；吉姆·索普（Jim Thorpe）在失去了他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金牌后也成为了美国印第安土著居民在美国生活中屈辱的象征。

确切地说，对于一个人称得上是政治性的东西，而对于另外一个人就不一定如此。许多评论家指出，在奥运会上挥舞国旗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国家狂热的表现。但是，当一名西德官员建议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取消挥舞国旗时，一名东德官员却宣称这代表了西德致力于抹杀东德在奥运会上的地位。1980年，

当英国运动员在奥林匹克旗帜下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时，一些西方人认为这是一个进步，但苏联组织者（那时他们正享受着世界范围内的东道主的身份）却称其为对神圣的奥林匹克传统的一种违背。在所有局势加剧紧张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每个国家的观众都认为他们的冠军参加的运动是最好的运动。确定政治在体育之中或体育在政治之中的角色，在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国家感情之间建立分界线——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不同的理解方式。

奥林匹克框架的每一个分支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进入奥运会。例如，一个国际奥委会成员可以认为他参加奥运会的任务是服务于人类，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而其他的成员可能只是因为一种责任感或者兴趣而参与。艾弗里·布伦戴奇曾经是一位奥运会参加者，他在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从没有在国际奥委会领取过工资，事实上，他每年要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 75 000 美元来支付他作为主席的费用。从那时起，国际奥委会成员都从国际奥委会领取报酬，但是国际奥委会的发言人经常将奥运会描绘成一种为了改善一个不合理世界中的人们的生存条件而做出的理想化的，甚至是狂想的努力。

这项竞赛的实际组织和管理者——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各国奥委会和奥运会组委会都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更不必说任务。举办奥运会的费用非常昂贵，组织者必须是专业人员。就象体育的其他分支一样，管理者中包括理想主义者，但“底线”是经济。他们必须得到钱才能送运动员去参赛，才能组织比赛，当然还要支付自己的花销。尽管公共和私人的消费可能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但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他们在保护自己势力范围的同时，代表着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的各种不同的利益。

有些人士抱怨，运动员实际上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被遗忘的元素。

运动员作为奥运会各个官方代表团的一份子，代表着一个被国际奥委会认同的政治实体。然而有时还是有一些调整的空间。佐拉·巴德（Zola Budd）作为

一名南非人被排除奥运会，而作为一名英国公民参赛，这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相反，让提·斯基那（Jonty Skinner）可能是 20 世纪 70 年代时世界上游的最快的游泳运动员，他却因为不能放弃自己的南非国籍而没有办法参加蒙特利尔奥运会。1996 年，当时的田径 800 米世界冠军威尔森·吉布凯特（Wilson Kipketer）不想代表他的母国肯尼亚参赛，但是国际奥委会不允许他以个人身份参赛。速滑运动员巴特·维尔德坎普（Bart Veldkamp）因为反对荷兰的选拔系统而加入了比利时国籍，并在长野冬奥会上获得了 5 000 米跑的第三名。总之，国籍是一个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首要考虑因素。

运动员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得参赛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名额的限制，世界上的大国得到了大部分的奖牌，所以一名世界级的运动员如果能代表一个小国家参赛，那么他参赛的机会将大大增加。当然，肯尼亚运动员和奥地利滑雪运动员是例外。[奥地利没有为“雄鹰”艾迪（Eddie）提供参赛位置，后来在卡尔加里奥运会上，他成了英国运动员。]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人可能觉得自己代表的是自己或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一项事业。著名的芬兰运动员帕渥·纳尔米（Paavo Nurmi）就宣称：“我是为自己跑，不是为芬兰。”另外一名芬兰运动员汉斯·科尔曼宁（Hannes Kolehmainen）看到在自己的冠军颁奖仪式上飘扬着俄国国旗时感到十分失落。在一项没有经济奖励的运动中，荣誉和成就感就成了最终的奖励。然而在滑冰、拳击或田径之中，金钱就可能成为超越荣誉的最终奖励。

参赛权之后的荣誉以及奖励的竞争也可以引起一些负面现象：一名入侵者用一条金属棒攻击了一名滑冰运动员，很明显，他是想使她不能参加在挪威举办的利勒哈默尔的奥运会。一名赛跑选手因没通过赛后的药检而失去了汉城奥运会的金牌；蒙特利尔奥运会上一名击剑运动员非法包装自己的武器；汉城奥运会上一名举重运动员未能通过药检而失去了奖牌。1960 年在罗马，一名自行车运动员因兴奋剂服用过量致死。许多国家给奥运会奖牌得主以经济奖励（事实上，许

多运动员非常喜欢这种做法)，实际上增加了运动员寻求“竞技极限”的压力。这样，问题就停留在“教练和体育官员到底知道多少类似事件？”

对于这样的事件，尤其是兴奋剂丑闻的调查主要考虑的问题是运动队的参与与否，而不是个人或者教练的操纵。1997年4月，《体育画报》指出：“所有的奥运奖牌得主都有可能使用了可以提高成绩的物质并且药检已经没有什么威慑力了”（Bamberger, Yaeger）。这反过来又成为了在洛桑举行的特别奥林匹克会议药检方面的主题。国际奥委会的医疗委员会答应在悉尼奥运会上采取更加有效的检查手段。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弗朗西斯·卡拉德（Francois Carrard）写信给《体育画报》，称他们将矛头指向了奥运会而没有指向“那些没有反兴奋剂措施的竞赛”（《体育画报》，1997.5.19）。后来国际奥委会赞助了1999年召开的世界反兴奋剂大会。这些交流将此问题定位成个人使用兴奋剂，而不是领队官员的问题。兴奋剂的使用可能带有更广泛的政治动机。

东德的体育活动就是主要的例证。由于东德已经不复存在，无数关于它使用兴奋剂生产冠军的揭发此起彼伏。在东德的全盛时期，它的运动员，尤其是女运动员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而且有些狂热者如道格拉斯·吉尔伯特（Dollglas Gilbert）因此变成十分受尊敬的典型。东德消失以后，丑闻被揭发，而且出现了关于收回那些被确定使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的奖牌的讨论。田径官员们拒绝收回东德运动员得到的奖牌，坚持声称这些运动员通过了必要的药物检查。1998年美国提出重新考虑70年代和80年代的游泳奖牌的问题，国际奥委会在德国奥林匹克官员的反对下同意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同时，记者和其他的评论家也必须在对正在开展的运动进行报道的时候多加小心。1996年秋，全国广播公司（NBC）就其评论员在谈论中国游泳运动引发了诸多问题而公开道歉。1998年1月，在澳大利亚的佩思举办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国际泳联剥夺了一位德国教练的资格，但是后来在面对法律诉讼时不得不

重新给予其教练资格。美国赛跑运动员布奇·雷诺德（Butch Regnolds）在美国赢得了基于药检结果对他的禁赛处罚的诉讼，这使得田径官员们大伤脑筋。在亚特兰大，体育仲裁法庭驳回了国际奥委会对几名俄罗斯运动员的禁赛。长野的体育仲裁法庭恢复了一名药检大麻呈阳性的滑雪板冠军的头衔，这对国际奥委会的条例以及其实践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可能不经过政府的同意，但政府只要愿意便可以强制运动员使用。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警告苏联体育官员，苏联的运动员必须每人通过药检。他们都通过了，由于许多来自东欧国家的运动员没有通过，苏联得到了不少额外的奖牌。随着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和兴奋剂使用的越来越复杂化，惧怕法庭诉讼和花费的奥林匹克官员不得不面临越来越多的关于定义兴奋剂和强化药物条例方面的问题。

评论员们对于运动员经济条件的改善既欢呼又哀叹。通常，权威人士蔑视19世纪英国的“业余化”概念，并将其作为上层阶级势力和特权的代名词。但同时，一些权威人士也在保护业余化观点以使体育远离“经济侵略”。最早的“业余选手”概念出现在1866年，将业余选手定义为一名“绅士”，不为了金钱而比赛。同时，更重要的是，不与职业选手比赛。1894年的国际奥委会规定业余选手是“一名从没有参加过对任意参赛者开放的比赛，或没有为了现金奖励或任何来源的金钱而比赛，或与职业运动员比赛，而且是从没有在生命中的任何一刻接受过作为体育教师或教练的报酬的人。”参加奥运会的体育团体应该向参赛者支付其费用，但仅此而已。并且，应采用一切手段禁止赌博。

实际上，业余化概念是难以捉摸的。一战之前，英国人谴责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员都是真正的职业运动员。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蔑视德国的训练方法和实践。50年代~60年代，美国人认为苏联运动员是“可耻的人”，而非真正的

“业余运动员”。业余化对于奥运会而言只是一个参赛资格的问题，而职业运动员进入奥运会几乎是必然的。有人甚至认为这越快越好，这样就可以结束对于不断变化的、虚伪的“业余运动员”的定义。

奥运会对于职业运动员的开放加剧了竞争，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体育理想。国际足联作为国际足球运动的统治性机构，在1980年以后准许了职业运动员进入奥运会，但是增加了年龄限制，以此来保证足球世界杯大赛的地位。相反，职业运动员的进入大大改变了奥运会篮球和冰球项目。例如，现在在北美冰球大联盟（NHL）比赛的欧洲运动员的数量就增长了长野冬奥会冰球项目的国际竞争。在篮球项目中，从1972年~1988年的5届奥运会中，美国只拿到了两个冠军，但从1992年~1996年NBA的“梦之队”的统治地位引起了关于奥运会是否容许了太多职业运动员的激烈讨论。然而，职业运动员似乎已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站稳了脚。

传媒，尤其是电视网络的转播增加了运动员的收入，也成了奥林匹克各种关系中十分有争议的一个因素。电视在奥运会的发展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电视经营人博特·苏加（Bert Sugar）曾经夸张地说：“如果奥林匹克运动不曾存在的话，电视也会发明它”。有人把奥运会称为“传媒构建的现实”（Moragas Spa, Rivenburgh, and Larson, 1995）。但是当美国电视在友好运动会的形式中进行新的挑战 and 尝试的时候，尼尔森指数并没有期待和承诺的那么高，于是特纳广播公司（TBS）不得不补偿其广告商。相反，奥运会有着独立于电视的神秘性，但是电视和奥运会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共生性的关系。

电视时代以前，奥林匹克舞台是相对狭小的。20世纪50年代，一些国际奥委会的官员曾经考虑通过征收一项全球性的体育运动税收来支持奥运会。然而从60年代开始，电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关注，奥林匹克官员不得不向媒体妥协。根据亚特兰大的快报报导，奥林匹克官员要求将现代五项作为奥运会伟大

创始人顾拜旦先生发明的电视转播运动竞赛的重要内容，从而使之更富有刺激，否则考虑从奥运会中将其剔除。（长野冬奥会之前，国际奥委会决定在奥运会中加入女子现代五项。）奥林匹克官员声称，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全世界90%的电视机在收看奥运会的某一部分。电视的利益，尤其在美国市场上，已经成为奥运会预算的主要方面。

毫无疑问，电视转播也使得借助奥运舞台参与抗议活动的人的欢迎。事实上，摄像机成了武器。没有摄像的抗议自然就会消失，好的画面比单纯的文字抗议更加有效。例如，慕尼黑奥运会上劫持以色列人质的恐怖分子就明确要求电视和世界报业的关注。今天，人们可能仍然记得电视传递的画面而不知道恐怖分子向包围他们的德国官方递交的文件。电视播报员甚至可以成为他们正在报道的故事的一部分，正如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美国广播公司（ABC）播报员帮助美国运动员组织了反对罗得西亚人的抗议。

当然，电视延续着奥运会历史上的一个古老的主题——从观众和赞助商那里收集资金以支持花销。特别是19世纪，当体育比赛开始吸引更多观众时，它马上变得十分依赖于他们。诚然，体育比赛，即使是最廉价的比赛也要花钱。开始的时候是参赛者的个人花费，然后就是赞助人，当然还有观众的支持——门票收入。当印刷传媒开始报道体育比赛时，它是在满足大众的需要。相反，在推广体育竞赛的同时，它也帮助体育比赛形成了门票收入。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收音机扩大了体育观众的群体，当德国地方电视网提供了柏林奥运会的转播时，则木已成舟，大局已定。美国东海岸的观众现在在电视的眼中是主要的角色。1996年，纽约时报甚至也开始认为，批评国家广播公司对奥运会的转播值得刊发。

今天，在这个“大时代体育”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就是体育用品制造商。无论评论家多次声称“这只是一项运动”，但体育产业已经成为了大产